

董志新 著

Mao Zedong
Pin Laozi

毛泽东
品
老子



毛泽东品先秦诸子

毛泽东品
老子

董志新 著

Mao Zedong

Pin Laozi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5年·沈阳

© 董志新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品《老子》 / 董志新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5.2

(毛泽东品先秦诸子)

ISBN 978-7-5470-3392-0

I. ①毛… II. ①董…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②《老子》—研究 IV. ①A841.63②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46296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340千字

印张: 18

出版时间: 2015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高爽

责任校对: 李国宽

装帧设计: 范娇

ISBN 978-7-5470-3392-0

定价: 34.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争鸣是诸子百家

——毛泽东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先秦子学

放眼三千年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毛泽东特别钟情于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自由讨论热烈争鸣所涌起的波光浪彩……

先秦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的主体，“百家争鸣”是先秦诸子创立和传播学说的广阔平台。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列子》《孙子兵法》《墨子》《管子》《商君书》《鬼谷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先秦子学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先秦子学在年深日久的流传中，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

哲人常讲：儒家拿得起，道家放得下，墨家挺得住，法家做得彻，兵家干得成！

人们常说：入世则孔孟，出世则老庄；儒家重修身，道家讲炼养；儒家治世，道家济世……

一生中从先秦子学中不断汲取精神营养的毛泽东，评论“百家争鸣”和先秦子学也是他口中笔下的经常话题。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两千四百余年前“百家争鸣”的学术运动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百

家争鸣”学术方针，有一种血缘式的内在联系。

1956年夏初，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称“双百方针”）这一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所以能够提出，其前提包括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历史经验。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个历史过程。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3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是“百家争鸣”。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其中他讲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四天后的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总结讲话中又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作为提出“双百方针”尤其是提出“百家争鸣”的历史借鉴，毛泽东在四天的两次讲话中，都特别提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这是为“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寻求历史根据。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为当今提出“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性提供了历史佐证。

毛泽东谈历史上的“百家争鸣”，讲清了三方面内容：

一、“百家争鸣”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情。关于“百家争鸣”发生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有两种提法：一种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种说发生在战国初期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这两种提法，只是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在时间上后延了八十年（秦统一到汉武帝继位，前221—前140年），只是“百家争鸣”结束于秦“焚书坑儒”，还是结束于汉“独尊儒术”？二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笔者的意见是“百家争鸣”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末战国初为发轫期。随着老子、孔子、孙武子在此期的出现，随着《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的编撰流行，儒家、道家、兵家开始创立成型，这一时期各家主要是创立学说，互相辩驳的情况并不明显。

战国之时为兴盛期。此期儒家的孔子诸弟子、子思、孟子和荀子，道家的庄子和列子，墨家的墨翟，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兵家的吴起、孙臆和尉缭子，以及名家、农家、杂家、阴阳家、小说家、纵横家的各类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各家争相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辩驳攻讦，激浊扬清，高潮迭起，持续不断。秦、齐、楚等大国发动统一全国的争霸战争，使鬼谷子、苏秦、张仪、鲁仲连等纵横家登上历史舞台，纵横之术左右学术历史几十年。齐国“稷下学宫”的出现，使文化精英东移，汇聚齐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和鼎盛时期。

秦统一到西汉中为衰落期。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遭到重创，百家萧疏，法学独秀是凭借专制的力量而得以短暂的独尊。汉初与民休息，用黄老之术，实际上是道家崛起，领袖学术。汉武帝用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领风骚成为“在朝”学派，其他各家被打入冷宫成为“在野”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由于封建主义经济和私有制的发展，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的演变，以及士阶层的形成，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这个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诸侯国之间、各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激烈，代表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百家争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

参加百家争鸣的各种学派，史称“诸子百家”。其言“百家”，形容学

派之多、著作之众，并非实数。鸣指有所抒发或表达。“争鸣”指自由论辩，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指我国古代春秋末至西汉初儒、道、墨、法、兵、名、杂、农、阴阳、纵横等各家在政治上、学术上展开的各种争论，形成其诸子蜂起、学派并作、学术繁荣、自由论辩、相互争鸣的盛况和局面。

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思想家评述过“百家争鸣”：

庄子探讨了诸子百家的成因和特点，有论述为：“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庄子·天下》）

荀子亦言：“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是说“百家异说”的出现，实则因为“诸侯异政”的现实需要。

庄子和荀子只说“百家”，并没有区分哪一家。《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对其所论及的学派，都是只举人以为代表，而未标家名。若以后来所分家数核之，二者所论皆不外儒、道、墨、法、名五家。

直至西汉太史令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概括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并对各家学说之短长进行了剖析。（《史记·太史公自序》）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据刘歆《七略》，又将百家分为十家九流，除六家外，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除小说家外实为九流。班固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蠹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班固并就十家的起源及其学说的优劣短长问题进行了探讨。

诸子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宋钐、彭蒙、田骈、慎到、杨朱、孙武、孙臆、惠施、商鞅、兒说、许行、公孙衍、张仪、邹衍、韩非子、荀子等。

诸子履历，简述如下：

孔子（前 551—前 479 年），鲁国人，儒家创立者，春秋末教育家、思想家。曾经周游列国，推行政治主张，不被接受。晚年归鲁，专门授徒讲学，整理典籍。他的主要思想是“仁者爱人”的学说，主张“重民”“教民”“富民”。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维护君臣、上下、贫富之间的等级秩序。提倡“中庸之德”，认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最好的道德和方法。一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言论被门人后学编辑为《论语》。

孔子逝世，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之儒。

老子（约前 580—约前 500 年），姓李名耳，一说姓老氏，名聃。道家创始人。只当过周朝“守藏室之史”孔子向他问过礼。他提出“道”的范畴，“道”是虚无，它产生天地万物。阐发了“反者道之动”和贵柔守慈的辩证法思想，蕴藏着无比精湛的智慧。政治上主张“无为”，憧憬“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其著作为《老子》。

孙武（约前 535—前 480 年），齐国人，兵家创立者，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法。提出“兵者，国之大事”“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等军事思想。（《孙子兵法》）曾参战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墨子（前 478—前 392 年），墨家创始人，鲁国人，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士。他博通古书，创立墨家团体。有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心思想是“兼爱”，主张“爱无差等”，不分轻重厚薄，一视同仁地爱人。兼爱还要利人，有力量帮助别人，有财物分给别人，有道德学说教化别人。墨子相信老天爷有意志（“天志”）和小鬼赏善罚恶（“明鬼”），这是墨子思想的局限性。其著作为《墨子》。

孙臆（约前 378—前 302 年），齐国著名军事家，是孙武的后裔，因受庞涓的忌害，被处以臆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臆。马陵之战，他协助田忌统率齐军，大败魏军。于是，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十万魏军被歼。1972 年 4 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墓发现竹简本《孙臆兵法》。

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思想主要继承孔子的“仁”，并且在主张性善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仁政”学说。其具体内容就是要求当权者注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处境，使“民有恒产”，即不失去土地，实际上就是要巩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他的“仁政”学说以重民思想为基础，认为民、社稷、君三者相比，民最重要，因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得民心的重要性。他与万章之徒整理编辑成自己的著作《孟子》七篇。

庄子（约前 369—前 286 年），名周，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的精神本体。论证了万物齐一和区分事物不可能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主张“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的人生观。庄子传世著作为《庄子》一书。

杨朱(约前395—前335年),魏国人。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为我”,即“贵己”。《孟子·尽心上》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韩非子·显学》也说他“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他重视生命,即“贵生”,要求适当地满足人的欲望要求,反对过分纵欲。认为“侵物”即掠夺别人的财物是下贱的事。

慎到(约前395—前315年),赵国人,以区区布衣,在齐湣王时游说于齐之稷下,后世多道其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稷下学官讲学时提出“以道变法”(《慎子》佚文)和“事断于法”“势位足恃”(《韩非子·难势》)的思想,属法家重势派。慎子亦学黄老道德之术,曾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史记》之《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至其学术,则有属于道家者(《庄子·天下》),亦有属于法家者(《荀子》之《非十二子》《解蔽》)。

许行(约前390—前315年),楚国人,是农家的代表人物。滕文公执政时,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居住,弟子有数十人,儒家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弃儒拜许行为师。他们靠自己种地吃饭,打草鞋穿,织席子铺用,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主张贤人应与农民共同耕种,解决吃饭问题。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理想。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年),郑国人,治黄老刑名之学。为韩昭侯之相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致使七雄最弱者之韩,亦“国治兵强”,“终申子之身”而“无侵韩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史记》说他“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惠施(约前370—前310年),宋国人,名家的著名代表,曾任魏惠王相,博学善辩,学富五车,为庄子好友。他是名家的“合同异”派,论证“万物毕同毕异”,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又引申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庄子·天下》)

兒(倪)说,宋国人,是名家“白马非马”论的首倡者。曾在稷下学官善辩知名。说他“善辩者也,操白马非马也,服稷下之辩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田骈,战国时齐国人。他本学黄老,借道明法,与慎到齐名。曾讲学稷下学官,雄于辩才。从彭蒙之师学到“贵齐”要领,主张“齐万物以为首”,认为万物的同一是首要的。认识到“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庄子·天下》)。要求人们放弃一切是非,摆脱各自的是非利害,回到“明分”“立公”的自然之理,从“不齐”中实现“齐”。《汉书·艺文志》

著录《田子》二十五篇，列入道家。已佚。

宋钐，宋国人。齐宣王时与尹文同游稷下学宫，他认为“虚而无形”的是“道”（《管子·心术上》），它是宇宙的本体。提倡“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庄子·天下》）其思想主流，为道墨两家“忘我”精神的结合。他周游天下，上说下教，宣讲内容着重联系生活常情，使人们易于了解。《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十八篇，早佚。

公孙衍，战国时期魏人，纵横家中的合纵派代表，主张联合诸侯以抗秦。公元前333年，他赴秦游说任大良造，后来张仪为大良造，在公元前323年返回魏国，魏惠王任为将，他联合赵、燕、韩、魏、中山五国互相为王，合纵抵抗齐、楚、秦。公元前319年驱逐张仪回秦，公孙衍为相。第二年，公孙衍联合赵、韩、燕、魏、楚，挂五国相印，推楚怀王为纵长，由三晋出兵攻秦，秦大败联军，以合纵失败而告终。

张仪（？—前310年），魏国人，战国时期纵横家中的连横派代表，主张联合诸侯事秦。他游说入秦，秦惠王任为相。公元前322年他去魏劝说魏惠王实行联秦韩以攻齐楚的政策。当时惠施为魏相，主张联合齐楚抗秦。魏惠王听信了张仪的游说，罢惠施相，任张仪为相，这是连横说的胜利。秦要求魏事秦，魏不从，即出兵攻占曲沃、平周两地。秦的东进政策，使东方各国生畏。遭到了公孙衍的联合诸侯抗秦政策的排斥，公元前319年魏驱逐张仪回秦，接受了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说明连横又破产了。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收买了楚旧贵族，并以献出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使楚同齐断绝关系。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劝阻，遂与齐断交。当楚派人向秦索地时，张仪以六里相许为由，拒不承认六百里，公元前312年，楚发兵攻秦，遭到了失败。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常为人排难解纷，不受酬报。长平战后，秦军围赵邯郸，魏使游士新垣衍间道入城，劝赵尊秦为帝，以纾急患。鲁仲连面折辩者，反复诘难，坚持义不帝秦，稳定了士气民心。平原君要封他，他再三不受。后田单反攻聊城。燕将死守不下。他写信给守将，晓以利害，使城不战而下。田单欲赏以爵位，他逃隐海上。《汉书·艺文志》著录《鲁仲连子》十四篇，今佚，清人有辑本。

邹衍（约前324—前250年），齐国人，战国后期阴阳家的代表，是稷下学宫的辩者。公元前257年，齐王派他使赵与公孙龙辩论。他善谈天，齐人称他“谈天衍”。提出“五行相生”“五行相胜”说，以及“五德终始”

的历史观。

荀子（约前 325—前 235 年），名卿，赵国人，十五岁到稷下学习，齐襄王在位（前 283—前 265 年）时，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德高望重的“祭酒”。他提出“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观，“知道察，知道行”和“虚壹而静”的认识论，“制名以指实”的名实论，主张“性恶”的人性论，阐发了“隆礼至法”的政治论，还写下了音乐理论《乐论》。他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儒家大师和先秦思想的批判总结者。

韩非子（约前 280—约前 233 年），原是韩国公族，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一生不得志，然其学说，“切事情，明是非”，（《史记·老子非韩列传》）“采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孔丛子·韩非非圣人辨》）故谋杀韩非之李斯亦不得不称其言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史记·李斯列传》），法家之理论、实绩卓著，不仅促成强秦之一统，且亦支撑我国封建帝制达两千余年。

三、“百家争鸣”是说大家自由争论

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主要围绕“古今”“礼法”之争和“天人”“名实”之辨展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以及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各个领域。

战国早期法家商鞅就反对儒家《诗》《书》《礼》《乐》文化。商鞅反对儒书与儒术是很突出的。《韩非子·和氏》说：“商鞅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显然，商鞅变法时就烧过《诗》《书》。至于反对儒书与儒术的实例，《商君书》中不胜枚举。如《商君书·农战》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这是说儒家的书《诗经》和《书经》都有害于重农重战两个政策，不利于法治。《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的教材。商鞅为了贯彻他的农战政策，决意反对这些。战国末期法家韩非也反对儒书儒术。《韩非子·五蠹》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正是继承商鞅反对儒书儒术的主张。

法家以儒家为对手，道家也是如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道家书《庄子》杂篇有庄子后学所作《盗跖》一文，专攻儒家鼻祖孔子。这则寓言故事是以义军的领袖盗跖与孔子的对话为纲目，在往返对话中，盗跖慷慨陈词痛斥孔子的虚伪和尧、舜、汤、武的罪行，其主旨则在于抨

击儒家所推崇的古代圣贤的作为，批评儒家提倡的礼教规范，讽刺世俗儒士对荣华富贵的追逐，反衬道家尊重人的自然本性，提倡顺天之理，轻利全生思想的正确性。

墨家与儒家争鸣毫不含糊，痛快亮出旗帜，《墨子》中设《非儒》上下篇。墨子借晏婴丑诋孔子的话说：“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又说：“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由于儒者“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息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就会不可避免地“陷于饥寒，危于冻馁。”（《墨子·非儒下》）因此，“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战国中后期，齐国的稷下学官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都城临淄成为学术中心。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拥有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优厚的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齐国稷下学官的建立，又为百家争鸣繁荣文化创造了客观的有利条件。稷下学官创建于齐威王（前356—前321年）初年，学官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招纳天下贤士荟萃于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齐宣王时，“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到齐湣王、齐襄王时期，荀况“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学官之终结，大约在齐王建时期。前后绵延近150年，最盛时竟聚集数千人。

稷下学官广招人才，各家各派兼收并蓄。战国诸子之主要学派都有重要代表人物入入学官。如儒家前有孟轲，后有荀卿，另有颜闾、王斗、田过、公孙固等；道家及黄老学派有环渊、接予、季真、慎到、田骈、彭蒙等；墨家有宋钐、告子等；名家有尹文、田巴、兒说等。法家有慎到、田骈等亦属法家，或称道法家；阴阳家有邹衍、邹奭；纵横家有淳于髡、鲁仲连等。

学官诸子荟萃，各展其说，论辩自由。《史记正义》引《鲁连子》曰：“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此论辩之盛可以想见。而徐劫弟子、年仅十二岁的鲁仲连以田巴之言空洞无济于实事，斥之曰：“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竟使田巴叹服而“终身不谈”。

孟子是天下知名雄辩学者。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期，孟子两次入齐

住十余年时间，在稷下学宫讲学，都曾受到重视，被授予“客卿”的礼遇。百家争鸣，孟子所以好辩善辩，也是出于捍卫儒家学说的需要。孟子认识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杨朱和墨家学说的兴盛，严重威胁到儒学的命运和生存。孟子批判杨墨“为我”与“兼爱”的学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拒杨墨，同时也批评其他学派的思想。他关于“性善论”的思想，许多就是在对告子“性恶论”思想的批评中阐明的。孟子批评兵家说：“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这显然是反对兵家重战、备战、善战学说以及法家“奖励军功”和农战政策，从而确立儒家非兵休战的思想。孟子批评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说明社会发展必须有分工，治国者不能兼事生产，其思想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现实。许行主张无分贵贱君民并耕的理想是好的，却不合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只能流于空想。孟子在与不同意见的辩难中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批评争鸣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风气。

“百家争鸣”既表现为诸子的分歧，也表现为诸子的融合。“百家争鸣”的自由论辩，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各家思想学说的相互汲取与融合。各家对于先秦的学术都有所损益，因而都有所创新，同时也有所继承。诸子百家互相发难批驳，欲证明对方错自己对，就要认真探明辨清对方的弱点，以图击中要害；又要看准对方的长处，经过汲取加工，为我所用。因此，当时的思想界虽然分为各种学派，但又始终存在着“道为一体”的观念，走向融合。

战国晚期儒家代表荀况，长期熏陶于稷下学宫，其时社会发展明显趋向于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与稷下学宫各家思想相互撞击、汲取、交融的学术环境，在荀况的思想学说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荀况并不偏激，他注意分析各家学说的短长。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体，兼取道家、法家、名家之长，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荀学思想体系。

墨子虽然尽力非儒，但墨儒毕竟有着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同源共生的文化根基，这使两家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渐渐趋同。如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并以之批判儒家的宗法道德观念。然而，在不少方面，墨家的价值取向几乎与儒家如出一辙，墨家把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作为天下丧乱的原因。在《尚贤中》里，墨子认为：“入则不孝慈父母，

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由此可以看出，墨家与儒家虽然对立，但他们仍有不少相通之处。

稷下学宫的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大融合。这种融合在杂家著作《管子》中有充分体现。根据现有资料判断，《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反映了管仲的事迹和思想。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夺取了齐国政权，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思想，实行变法，形成了管仲学派。《管子》其书绝大部分是管仲学派的文集，也掺杂了其他稷下学者的论述。《管子》其书内容异常丰富，近人罗根泽《管子探源》说：“《管子》……在先秦诸子，哀为巨帙，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夥，论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可以说，《管子》吸纳先秦诸子的精华，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儒、兵、农、阴阳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此书的丰富内容。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说到底，它是百家争鸣诸子融合的产物。

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变革。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其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纵向延续和横向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焚书坑儒挫折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也分析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走向衰落的原因。

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陶鲁笏等四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这三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谈到秦始皇，毛泽东说：

人们从书中得知，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460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则相反，主张“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学说。秦始皇是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书。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陶鲁笏：《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此次谈话的主旨，是为秦始皇翻案，是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恶行辩护。他认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肆意妄为，而是有所限制：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法先王”孟子一派的儒；目的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毛泽东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结论。

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深刻指出了“焚书坑儒”对“百家争鸣”的负面作用：

负面作用之一：“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请注意，人们将“焚书坑儒”定位为“恶行”，毛泽东将其定位为“当然是坏事”。所谓“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生的两大事件，是秦始皇为巩固中央集权而实行的文化专制措施。“焚书”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儒学博士淳于越对于当面肉麻吹捧秦始皇的仆射周青臣不以为然，并就分封、郡县问题向秦始皇提出了不同意见。丞相李斯抓住淳于越主张“师古”的言论大做文章，指斥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如不加以严禁，必将使“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

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提出的建议和办法,遂下令焚书:除《秦纪》、医、农、卜筮之书外,凡六国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等书籍,一律限期三十天内上交官府烧掉,逾期不交者,黥为城旦。此后若再有“偶说《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有愿习法令者,以吏为师。“焚书”事件使儒生们大为不满和诽议。第二年,当秦始皇搜寻欺骗了他的方士侯生、卢生时,意外地发现咸阳的儒生对他进行所谓的“诽谤”,“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察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儒家、道家、兵家都是以对《诗》《书》《易》《礼》的文化反思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关东六国的士子大都在思想上反对暴秦,所以烧《诗》《书》杀儒生的“焚书坑儒”事件,是以强权政治宣告文化上“百家争鸣”局面的被迫结束。毛泽东在“百家争鸣”前面加上“蓬蓬勃勃”的形容词,又指出焚书坑儒“挫折了”这个局面,可见他心里他对“百家争鸣”局面的夭折是多么惋惜。

负面作用之二:“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毛泽东指出史实,秦始皇“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毛泽东说,“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人”。虽然秦始皇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需要专制手段,但是毛泽东仍然认为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生儒书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是“太过火了”。从传统哲学上说“过犹不及”。用现代语言说,这是谴责秦始皇文化政策太“左”。以消灭思想载体的办法实现思想一统,是不可取的危险的文化政策。

负面作用之三:“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条秦始皇是办不到的”。毛泽东把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做了区分,他说“政治上要实行专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是对比“我们”的政策与秦始皇政策,指出其不同点。“百家争鸣”,极权的、专制的秦始皇是不能办的,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毛泽东这些批判是深刻有力的,点到了问题的实质。解读毛泽东谈论“百家争鸣”的思想观点时,在注意到毛泽东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的一面时,千万不要忽略了毛泽东对焚书坑儒另一面的严厉谴责。毛泽东后一种思想更为重要,对今后的文化建设更有意义。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毛泽东的思维是辩证的。我们不能把毛泽东对焚书坑儒的辩证性评论,理解得片面了。

孔子是后来汉朝的董仲舒捧起来的

秦朝的“焚书坑儒”是极权专制文化政策的恶果。各地儒生并没有完全屈服于高压，采取各种办法暗中抵制。著名的“鲁壁”藏书事件是其典型代表。秦始皇下焚书令，追令天下交出儒家书籍，否则罹罪。孔子九世孙孔鲋将一些儒家书籍藏于室内壁中，然后持礼器投奔陈胜起义军，进行武装抗争。百余年后，西汉初封到曲阜的鲁恭王刘馥为了扩建宫室，在拆毁孔子旧宅时，发现这批古籍，被称作“古文经”。不久，王莽新政用它与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抗衡，推演出古文经学。

“焚书坑儒”之时，朝廷内博士手中的诸子书并未焚掉。秦朝博士有七十人，其中既有《五经》博士，也有诸子传记以及方技数术博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汉书·艺文志》所载，伏生为治《尚书》博士；黄疵为秦博士，则在名家；又有占梦博士。汉承秦制，汉初仍有博士七十人，但“备员弗用”。这个时期，文化政策还允许诸子百家之术存在，只是限制在朝廷博士圈子之内。私人授徒讲学，自由进行学术争鸣的局面已荡然无存。

真正使“百家争鸣”局面彻底消失的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件。

汉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出现了“文景之治”，但同时社会矛盾已开始暴露，至武帝时不仅外部匈奴为患日趋严重，内部矛盾也更加激化，并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史记·武帝本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因窦太后好黄老言，受其干扰，当时未果。建元六年，窦太后卒。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就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等治国大计，三次策问儒生董仲舒。董仲舒是《春秋》公羊派大师，今文经学创始人，他上“天人三策”，极力推荐《春秋》“大一统”的理论，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这一建议，罢黜百家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从而